



社会科学 方法论

DIE METHODOLOGIE
DER SOZIALWISSENSCHAFT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杨富斌 译



华夏出版社

★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

000

C8

242

抄

社会科学方法论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杨富斌 译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P

2000年 6月 6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方法论/(德)韦伯著;杨富斌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ISBN 7-5080-1644-0

I. 社… II. ①韦… ②杨… III. 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 IV. C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382 号

责任编辑 褚朔维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9.25印张 180千字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80-1149-X/Z·188

定价:15.5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

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目 录

以科学为业	(1)
社会学基本术语	(34)
“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	(100)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	(146)
文化科学逻辑的批判研究	(208)
爱德华·梅耶方法论观点批判	(208)
历史说明中的客观可能性和恰当因果关系	(260)

以科学为业

根据你们的希望,我在这里谈一谈“以科学为业”的问题。如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有一种传统习惯,即总是从外部条件开始谈论问题,我也是这样。在这里所涉及的题目下,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这一术语的物质意义上,以科学为业的各种条件是什么?在今天,这个问题无论从实践上看还是从本质上看都意味着: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决心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毕业生,他的发展前程是什么?为了解德国现有状况的奇特性,通过比较方法来阐述,以及用此方法了解外国的状况,不失为一种方便的办法。在这一方面,美国与德国形成最鲜明的对照,因此我们将把焦点集中在美国。

众所周知,在德国,一个献身于科学事业的青年人的职业,通常是从编外讲师的职位开始的。在与那些令人尊敬的专家们谈话并得到他们的首肯后,他以一本书为基础,并常常通过一次大学教师正规考试,就可以占据一个位置。然后他就开始上课,但没有任何薪水,只能得到听他讲课的学生们所交的听课费。这就取决于他在其职权许可

的范围内所要讲题目。

而在美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开始的,即先担任“助教”。这与德国较大的自然科学机构和医学机构里的情况大体相同,这些机构中通常只有一小部分助理人员试图使自己成为编外讲师,并且常常只是在他们职业的后期才这样做。

实际上,这种对照表明,德国大学教师的职业一般是以拥有财富为先决条件的。因为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如果没有资金作后盾而使自己置身于大学职业的环境中,那是非常荒诞的。他必须能够至少在数年间忍受那种无薪水的状况,而又不知道他是否有机会跻身于那个其待遇足以维持生计的位置。

而在美国,由于存在着官僚制度,年轻的大学教师从一开始就有报酬。无疑,他的薪水一开始并不高,通常几乎不如一个半熟练工人的工资多。然而由于他获得的是固定薪水,所以他似乎占据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然而,作为一种惯例,就像德国助理人员一样,他会接到离职或退房通知,并且如果他不应该事负期望的话,他通常确定无疑地会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况。

上述那些期望就是:美国的年轻大学教师必须能够吸引大批学生听他的课,而这种事情对一位德国的临时教员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德国,一旦有人使用了一名青年教师,就不能再辞退他。无疑,他也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他有一种可以理解的观念,即在经过数年的工作之后,他在道义上具有一种期望某种考虑的权利。他还期望——并且这常常是至关重要的——当其他编外讲师来到而有可能出现取得资格的问题时,人们要对他有某种关照。

原则上,是否应让每一位合格的学者取得大学讲课资格,或者是否应当考虑入学人数,因而赋予现有教工一种教学垄断权——这是一个棘手的二难推理。这个问题与大学职业的两面性有关,对此我们现

在就予以讨论。通常,人们在作出决定时喜欢第二种选择。但这样做有危险,即那些受人尊敬的教授,无论他多么正直,总是喜欢他自己的弟子。倘若要我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必须说我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即由我推荐的学者必须在其他大学由其他人使其合法化和取得资格。但是其结果却可能是,我的最好的弟子之一在另一所大学被否决了,因为那里没有人相信这正是其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区别是,德国的编外讲师通常不能讲他想讲的那么多课。按照他的正式权力,他可以在他的专业范围内讲授任何课程。但这样做将被视为对较老的编外讲师缺乏适当的考虑。通常,正教授上“大”课程,而编外讲师则把自己局限在二流课程上。这些安排的好处是,大学教师在其年轻时可以自由地搞科研,尽管这种对上课机会的限制有点不情愿。

在美国,这种安排原则上是不一样的。恰恰在其事业的早期阶段,就是因为助教是领薪水的,所以他的工作绝对是超负荷的。例如在德语系,正教授讲三个小时有关歌德的课就足够了,而一个年轻的助教除了接受德语训练以外,倘若他每周十二节教学工作量还包括譬如乌克兰的作业的话,他将很高兴。课程表是由行政人员安排的,对此,助教是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的,这同德国大学中助教的情况一样。

近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大学在科学的广泛领域里正朝美国制度的方向发展。大型医学或自然科学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它们不能没有相当的经费。这里我们遇到了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在何处运作都要出现的情况:“工人与他的生产手段相脱离”。这种工人即助教依赖于国家分配给他的位置上的任务;因此他对那个机构首脑的依赖,就像工厂的雇员依赖于经理或资方一样。因为这些机构的首脑主观上真诚地认为这个机构是“他的”,因而他在其工作中会全力以赴。这样,助教的位置像任何“半无产阶级”的存在一样,常常

是不稳定的,这就同美国大学中助教的位置一样,不很牢靠。

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德国的大学生活就像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样,已经美国化了。这种发展,我确信,将会吞没工匠个人拥有那些工具(从本质上说,即图书馆)的规章制度,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在我的领域中仍然如此。这种发展与过去手工艺人所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同,并且现在正在全速前进。

正像对所有资本主义以及同时对所有官僚企业一样,所有这些都有不容置疑的好处。但是在这些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不同于德国大学中的那种历史氛围。在这些大型资本主义大学企业的首脑与旧式的正教授之间,通常存在着一条外在的和内在的巨大鸿沟。这种对照也存在于内在的态度上,我在此不打算谈论这件事。旧的大学制度内在地和外在地成为虚假的了。仍然保留下来的和实质上增加的东西,是一种对大学职业非常奇特的因素:这类编外讲师以及助教是否能成功地跻身于正教授的行列,抑或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这纯属偶然。无疑,机遇不会单独起支配作用,但它有非常高的概率。我简直不知道在其他任何职业中竟然还会有起这样一种作用的机遇。在我的早年生活中,我被委任为一个学科的正教授,在那个学科中,我的一些同时代人无疑比我取得的成就大。由于我个人把这件事视为纯属偶然,所以我更要这样说。并且根据这种经验我还设想我有一双慧眼,能看透许多人的命运乖舛,即看到偶然性把他们固定在相反方向了,并且在这种可选择的机会内,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获得他们应得的位置。

偶然性而不是能力起这么大的作用,这种情况由于“人的和太人化的”因素而不是孤立的甚至主导的因素,它们正像在其他任何选择中一样,自然地出现在学院里的选择过程中。无疑,如此众多的平庸之人在各个大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让教育部门或其全体成员的

个人低能为此负责,则是不公平的。毋宁说,平庸占主导地位是由人类的合作法则所造成的,尤其是几个实体相互合作的法则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由全体推荐人和教育部门的合作法则所造成的。

罗马教皇的选举情况也是如此。这种选举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它是与大学选择教师性质相同的最重要的可控选择的例子。人们可能会说红衣主教是“获胜可能最大的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通常是第二号或第三号红衣主教获胜。美国总统的选举情况也同样如此。只有在例外情况下,一流的和最优秀的人才会得到议会的提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二流和三流的人物被提名,并随后参加竞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领域构造了技术的社会学术语,通过研究这些例子而探究集体意志所赞成的选举法将是非常有趣的,但我们在此不这么做。然而,这些做法仍然由德国的大学实体坚持着,并且人们对司空见惯的出错现象已不一定会感到惊讶,相反,对一些正确的任命则感到惊奇。尽管如此,其中的这一部分则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只有当议会(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如迄今在德国)——两者异曲同工——或掌握政权的革命者(如现在德国)出于政治原因而干涉学校对教师的选择时,人们才能肯定那些适合一时情况之需的平庸之辈会有机会被选中。

任何大学教师都不愿意提起自己的任职问题,因为那是很少令人惬意的。然而我要说,在许多我所知道的场合,无一例外地具有决定性的客观理由,这是善良意志所允许的。

人们还必须明白:决定学院命运的“偶然性”因素非常大,这不完全是因为集体意志形式的不充分所造成的。每一位感到自己有希望成为学者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或有两面性)。即,他必须不仅做一个称职的学者,而且必须做一名

称职的教师。而这两者并非都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同时却是一位令人讨厌的蹩脚教师。还需要我向你们提起像赫尔姆霍茨或者兰克这样的人的教学情况吗?他们决不是罕见的例外。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德国的大学,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的大学,正在为争取入学人数而进行一场非常荒唐的竞争。大学城中提供住宿的房主们节日般地庆贺第一千个学生的到来,并且他们喜欢以火炬队列庆祝第二千名学生。对费用的兴趣——人们必须公开承认这一点——受到“吸引公众”的邻近领域中的任命的的影响。并且除此以外,录取的学生数量是对教师资格的一个检验,它也许是根据这一数字来认定的。而学者的资格是无法正确估价的,并且人们对那些大胆的创新者的评价恰恰经常是有争议的——这很自然。因此,几乎每个人都会受到那种不可估量的庆贺的暗示和大量录取学生的影响。说一个临时讲师是一个蹩脚的老师,通常这等于宣判了他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死刑,即使他是个世界知名学者也是如此。他究竟是一名优秀教师,还是一位蹩脚的教师,听课人数对此问题作了回答,这是学生们屈尊地给予他的荣誉。

事实上,学生是否成群结队地去听哪一位教师的课,在很大程度上(大于人们有可能认为的那样)取决于纯粹的外在因素:如教师的性格,甚至其声调的抑扬顿挫。除了教师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合理的见解以外,我对那些吸引大批学生的课程总有一种深深的怀疑,不管这种情况多么不可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它该用的地方。科学的训练,正如我们根据德国大学的传统所实际从事的那样,是精神贵族所从事的一种事业,对此我们不应该自我隐瞒。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提出科学的问题,即未受教育但有接受能力的头脑都能理解它们,并且——对我们来说具有独立的决定意义的是——能够逐步达到独立自

主地对它们进行思考,这肯定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种任务是否能实现,不是由入学人数来决定的。而且——回到我们的主题上——这种技能是一种个人天赋,它无论如何是与学者的科学资格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法国相比较而言,德国科学界没有“科学院院士”那样的法人实体。根据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当合法地做好研究和教学这两项工作。在一个人身上是否能同时发现有这两种能力,这是一件绝对偶然的事。因而学院生涯是一种疯狂的冒险。假如有一位年青学者就资格委任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几乎不会对他进行鼓励。如果他是一位犹太人,人们当然会说:“别抱任何期望了”(Lasciate ogni speranza)。但人们必定会问其他每个人:你果真相信,你能数年如一日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平庸之辈超过你,而又能坚持既不怨恨也不悲伤吗?诚然,人们总是可以听到这样的回答:“当然,我只是为自己的‘内心感召’而生活。”然而,我发现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又不陷入悲伤的人,只是凤毛麟角。

以上这些就是我认为有必要对大学教师职业的外部状况所说的话。但我认为,你们实际上是想听一听其他事情,即科学的内在感召力。在我们的时代,内部的情形,相对于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的组织而言,首先受到下列事实的制约:即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保持下去。不仅外在的而且内在的事情都站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即个人只有在他是一位严谨的专家の場合,才能在科学领域获得某种关于真正完满的东西的确定意识。

所有与相邻领域重迭的工作,例如我们偶尔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社会学家们必然地一遍又一遍地所不得不从事的工作,都背负着顺从地理解下述情况的负担:即人们充其量给专家提供的那些有用的问题,是一些从他自己的专业观点来看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每个人自己

的工作必定是极不完善的。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科学工作者才能完全地意识到——只有一次,也许他一生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他取得了某种永久的东西。一种真正确定的和卓越的成就,在今天总是专业化的结果。无论何人,只要他缺乏(譬如说)运用观察工具的能力,并且认为他的灵魂的命运取决于他对某一篇手稿的某一段的猜测是否正确,那么他最好还是远离科学。他决不会有人们所说的那种关于科学的“个人经验”。倘若没有这种奇怪的陶醉(它常常受到局外人的嘲笑),倘若没有这种激情,没有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激情,而只是根据你是否成功地做出了这种猜测,那么,你就失去了对科学的任何需求,因而你应该改行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因为除了以富有激情的献身精神去追求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使人真正成其为专家。

然而,无论这种热情多么真诚和深厚,再大的热情也不能促使一个问题取得科学的成果,这是事实。当然热情是“灵感”的前提,而灵感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如今,在年轻人的圈子中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观念。它认为,科学已经成为一个计算和实验室中的组装问题,或者就像“工厂”中的统计归档方法一样。这种计算只涉及高级的理智活动,与人的“心灵”无关。首先,必定有人会反驳说,这种观点缺乏对工厂或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清楚说明。在这种场合,某些观念一定会出现在某人的头脑中,并且还必须是一个正确观念,如果此人打算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话。而且这种直觉能力不能是被迫的。它对任何客观的计算丝毫没有影响。诚然,计算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前提。例如,任何社会学家都不会认为他自己太笨了(即使在其老年),因而不能在头脑中作千分之十的小量计算。也许他数月只计算一次。如果一个人希望计算一些东西,即使最终结果常常实际上很小,他也不能不受惩罚地试图把这一任务完全转换到机器助手之中。但是,假如在

计算期间,关于计算方向、关于那种突现的单一结果的任何“观念”都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那么即使这个小结果最终也不会得到。

通常,这种“观念”只是在非常艰辛的工作沃土中才能形成,但的确并非总是这样。从科学上说,一个科学爱好者的观念对于科学的意义也许与专家的观念相同,甚至比后者还要大。我们的许多最佳假设和顿悟恰恰是由科学爱好者们提出来的。正如赫尔姆霍茨评价罗伯特·迈尔时所说的那样:外行不同于专家的地方,仅仅在于他缺乏一种牢固而稳定的工作程序。结果他通常不能控制、估计或利用其成果中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工作的替代品,而工作反过来也不能代替或推动观念,这就正如热情所能起的那一点点作用一样。热情和工作,尤其这两者的结合,并不能诱导出这种观念。

观念是在它们高兴时才对我们显现的,而不是在它们使我们高兴时对我们显现。最好的观念实际地出现在人的头脑中的方式,正如艾瑞斯所描述的那样:它出现于坐在沙发上抽烟时;或如赫尔姆霍茨以科学的精确性谈到他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它产生于在缓慢下坡的街道上散步之时;或者它是以其他同类方式产生的。但在任何情况下,观念都是在我们对它们没有期望时所产生的,不是在我们对之苦思冥想和搜肠刮肚时产生的。然而,倘若我们不在书桌旁苦思冥想,并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寻求答案,我们头脑中也确实不会产生这些观念。

无论这将如何,科学工作者必须考虑所有科学工作中所存在的危险:一种“观念”会不会出现呢?他也许是一位优秀的工作者,然而他从未提出任何他自己的有价值的观念。如果以为仅仅在科学中是这样,而例如在商业办公室的情况则与实验室不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个商人或一个工业巨子如果没有“商业想象力”,即没有观念或理想直觉,他将终生最好一直做职员或技术人员。他在组织中决不会有真正的创造性。灵感在科学领域内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不像学院里的

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想象的那样,比一位现代企业家在实际生活中掌握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大。另一方面,并且也是经常引起误解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灵感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在艺术领域中大。如果以为一位数学家所获得的任何科学上有价值的成果,只是他坐在书桌旁运用一把尺子、一个计算器或其他机械手段获得的,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对一个维尔斯特拉斯^①问题的数学想象,在意义和结果方面自然都非常不同于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它们有根本的质的不同。但是,它们的心理过程则没有区别。两者都是疯狂似的激动(柏拉图意义的狂热)和充满“灵感”的过程。

那么,除了天赋以外,我们是否有科学灵感所依赖的对我们来说是隐蔽着的命运?由于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最后但一样重要的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已经很流行,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即他们开始崇拜偶像,他们的偶像今天在所有街道胡同和各种期刊中占据了广泛的空间。这些偶像就是“人格”和“个人经验”。这两者是内在相关的,那种流行的观念是,后者构成了前者并隶属于它。人们不辞辛苦地竭力去“体验”生活——因为那样有益于建构人格,能意识到它的秩序和位置。而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体验”生活,我们必定至少假装具有这种优雅的天赋。以前我们称这为“体验”,用清楚明白的德语说,称之为“感知”;我认为这样就对何谓人格及其意义是什么,有了一种更为合适的观念。

先生们和女士们。在科学领域中,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而且不仅对科学领域是这样;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艺术家,除了致力于他的工作、他的唯一的工作以外,他将一事无成。就他的艺术而言,即使像歌德这样优秀的人的个性,试图冒昧地

① 德国数学家,现代函数论创立人之一——译者注

把他的“生命”融入他的艺术品之中,那也是有害的。即使对此有怀疑,人们也必须成为一个歌德式的人物,才敢于允许自己有这种自由。每个人至少得承认这一点:即使对像歌德这样的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人物,如果没有报酬,这种自由也是行不通的。在政治生活中,情况则有所不同,但我们今天对此不予讨论。然而在科学领域,如果一个人使自己成为他必须为之献身的题目的指挥,并走上舞台,寻求通过“经验”而使自己合法化,并问:我如何能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专家”,我如何能说出形式上或内容上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那么这种人是无“个性”的。今天这种行为是一种公众现象,它总是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并贬低了与此相关的那个人。与此不同的是,对这一任务的内在倾心,并且仅仅由于这种倾心,应该把科学家提升到他决心为之服务的学科的高度,应该使他获得与这一学科相当的尊严。在这一方面,他与艺术家没有什么两样。

与科学工作和艺术共同具有的这些前提相对照,科学有一种命运,它把科学与艺术工作明确地区分开来。科学工作总是与进步相联系的;而在艺术领域则没有同样意义上的进步。一个时期的艺术品不能创造出新的技术手段或(例如)新的透视规律,因而从艺术上说,它不会高于不包含所有这些手段和规律的知识艺术品——如果它的形式能适当地处理材料,即如果它的对象这样选择和构成,以致不应用那些条件和手段就能艺术地掌握它。一件真正“完成”的艺术品是决不会被超越的;它将永远不会过时。对艺术品的个人意义而言,每个人的欣赏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谁也不能说这件作品被另一件“完成”的作品超越了。

在科学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将会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内变得陈旧过时。这是科学的必然命运;这也正是科学工作在非常特定的意义上与其他通常坚持的文化领域相对而言所具有